

何希圣诗水篇作人题



回忆追念集

黎利利 著





初平集水篇

作人題



回忆 追念 影存

黎莉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黎莉莉著.—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2

ISBN 7-106-01841-4

I.行… II.黎… III.黎莉莉—回忆录 IV.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281号

责任编辑:徐维光

封面设计:汤红丽

版式设计:北京全彩未来广告公司

责任校对:李青

责任印制:刘继海

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

黎莉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100013

电话:64299919(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宝天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1/20

印张/14 字数/16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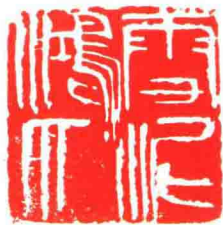
印 数 1-1500册

书 号 ISBN7-106-01841-4/I·0322

定 价 230元

目 录

1	前言
2	童年
2	琐忆童年——我的“小朋友”
4	寄宿笃志女校
5	在孤儿工读园
5	过寄张家
6	拜琴雪芳学艺
8	住在兴盛胡同的日子
8	远送张家口
10	一家子演电影
13	我的父亲和母亲
16	我的义父
18	半工半读——一边拍电影，一边上学
25	投身抗日洪流
29	在重庆
32	美国纪行
37	新中国诞生
45	回忆中华歌舞团、明月歌剧社
56	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美国生活片断
73	为中国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罗静予同志
86	孙瑜老师
90	一封没有发出的回信——致孙瑜



99	寓意团结抗战的《狼山喋血记》——追悼费穆先生
109	回忆和蔡楚生同志在一起的年月
114	影片《塞上风云》的摄制历程——兼怀应云卫同志
126	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战的第一部影片《塞上风云》
129	回归线上
132	浅谈阮玲玉的表演艺术
136	一颗影星的陨落——忆阮玲玉
141	我演塔吉雅娜
146	漫谈演员的本色——回忆影片《大路》表演点滴
153	挚友绣文
161	念故人
166	人美安息
167	黎莉莉访谈录
173	《国际和平年》在新加坡
180	明星·园丁——我的老师黎莉莉
附录:	
182	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
188	红军中的艺术家钱壮飞
204	行云流水
205	门外絮语

前 言

黎莉莉老师在耄耋之年，以坚韧的毅力完成了她的专著《行云流水篇——回忆、追念、影存》。这是她一生的掠影。

莉莉老师是幸运的，她的表演生涯紧紧和中国早期进步电影联系在一起。莉莉老师的一生又是坎坷、多难的，但她从未放弃认真的追求。早年认真求艺、认真演出，中年认真学习、认真教学，晚年认真写作，笔耕不辍，她过着认认真真的一生。

《行云流水篇》的作者，是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参与者，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健在的见证人。她记录了早期电影人物的创作生活、人情世故；也回忆了她那令人敬佩的父母，那带有革命传奇色彩的家庭，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曾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活跃过的一代风流人物。作者以她对往事的清晰回忆，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代。对故人的追念和珍贵的影存更使这种历史真实倾注了情感，真切动人。艾中信老先生的篆刻别具风貌，插图装帧考究，更增添了阅读的情趣，产生了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位。

莉莉老师曾在三、四十年代中国银幕上，留下了无数多姿多采的青春倩影。如今，当我们阅读这珍贵的电影史料时，眼前又浮现出一位具有学者风范的孜孜不倦的长者，她以一片丹心，勤奋地撰写着、倾诉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潘 虹 刘诗兵

童 年



回忆童年，好像一片暗淡的月光，使我感到迷茫。记得八岁的时候，母亲把我送进孤儿院，我不愿意去，哭着、闹着，扯住她的衣服不放，母亲轻声哄我说：“孩子，你已经长大，应该进学校了，我会常来看你的。”万分不得已，我只好住进了这所孤儿工读园。

工读园接收了许多孩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每顿饭都是一个窝窝头，半碗白菜豆腐。白天，大孩子去做工，年纪小的看图识字。天气寒冷时，为了取暖，大家一起玩“挤老米”（“挤老米”是北京孩子中的土话，指一种游戏。冬天孩子们大家靠在墙上互相挤扎取暖，往往挤出一身汗，以此为乐。）。每当想起妈妈时，我总是长久地扒在工读园的大铁门上，瞧着过往的行人。偶然看到别人的妈妈牵着自己孩子，孩子手里还抱着洋娃娃，我心里别提有多么羡慕啦！我想着，盼着，盼望妈妈出现在我的眼前，也带来一个洋娃娃。盼呀，盼呀，可是她一直没有来，没有来。

孤儿工读园的李老师，他父亲去世了，工读园的孩子们都去他家中拜祭。我们好像一群小野马放出了马厩，在场院里跑呀！蹦呀！还大声呼叫。一声集合哨响，我们排队进入灵堂，看到李老师穿着白色孝衣跪在灵前，我的心忽然缩成一团，很恐惧，想哭，但是憋住，默默地向前行鞠躬礼。李老师突然把我搂到他怀里，叫一声“孩子呀！”这意想不到的亲情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放声大哭起来。李老师在我耳边喃喃地说：“你的爸爸、妈妈为了革命奔向远方，他们要回来的，会回来的。”李老师的话融解了我心中冻结的冰块，拨开了迷茫的云雾，见到了我心中的天……（注）

注：这一段“童年”是我早年的回忆，现收在这本集子的前面，作为引言。195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通知我去参加由苏联专家卡赞斯基主持的演员进修班。我当时正忙着接待香港来京的影剧界朋友们，因此没有做好应试的准备，临时选述了生活中的片段腹稿——童年，作为进修班自拟试题的朗诵词。关于应试进修班的情况和学习、结业的过程，我在另一篇《我演塔吉雅娜》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琐忆童年——我的“小朋友”

我约六岁时，家住北京西城六铺炕的一座四合院内。母亲用五颜六色的小石头子铺了一米多宽的石子路，以防雨天踩泥滑倒，还在院子四周种满矮的翠柏，树周围种了很多太阳花，夏天傍晚坐在小院子里，看着琳琅满目的花，美丽极了。家中人口不算少，但

是各人忙各人的事情，父亲、母亲早出晚归，除了在北京国立医科专门学校学习，还忙其他事，当时我年幼不甚清楚。祖母当时五十多岁，我们称她娘妈，态度很严肃，脸上少有笑容。她特别溺爱弟弟钱江。大姐上小学，老张妈照料家务。我经常看着弟弟围着娘妈膝前膝后转，心中好羡慕哩！全家算我是个闲人，虽然有这个万红千紫可爱的小院，我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冷清，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坐烦了走出大门，隔壁是一家煤球铺，我就呆看“煤黑子”摇煤球（北京旧时称做煤球的师傅为“煤黑子”）。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走过了煤铺，一直往西走，发现有一片空旷的场院，外面的草长得比我人高。我钻了进去，再往前走是一个很宽的大院，有几栋漂亮的洋楼，却没有发现人。院里有一片树林，槐树长得很高大，上面挂着很多“吊死鬼”（北京人称“槐树虫”为“吊死鬼”），再往深里走，飞着许多蝴蝶、蜻蜓、蜜蜂，还听到蝈蝈、蟋蟀的叫声，草里还蹦跳着蚂蚱。比起我家小四合院好玩多了。我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大院”。从这以后，我每天吃过早饭或中饭后，只要家中没人注意我，总是朝“大院”里遛。

在“大院”里，我喜欢玩“槐树虫”。它从槐树上拖下一根长丝，迎风摇晃。我搬起一块大石头垫在脚下，小心翼翼地拉着丝把“槐树虫”从空中取下，放在地上。我在地上挖了曲里拐弯的轨道，让它在轨道里爬行，若是爬出了轨道，我就用小树枝指挥它，让它走上“正轨”。反复玩多次后，我再把它送回槐树上去，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

除了“槐树虫”，我还喜欢玩蚂蚱。逮蚂蚱可不像玩“吊死鬼”那么简单、方便。先要钻进草丛里去寻找，行动要轻，动作要敏捷，跟踪时要诡秘，只能蹑手蹑脚地不能让它发现。每逮住一只蚂蚱，要费很多脑子和力气，但随之而来的是开心，爱不释手。我用父亲的船主牌香烟盒子，把各种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蚂蚱分装在烟盒子里，心想让它们孵出小蚂蚱。把烟盒放在一个鞋盒子里，藏在一个我认为别人找不到的角落，第二天再去玩。回到家，装成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心中很满足，只是担心我的“小朋友”们别被他人偷走。为了保密，我连大姐也不敢告诉，特别怕让妈妈知道，她会禁止我乱跑。大姐性格比我随和，她经常帮助老张妈做些零碎家务，我趁她们不注意就溜进“大院”。日久天长，发现没人理会我，胆子就大起来，除了下大雨、刮大风，基本上在“大院”里度过。“大院”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昆虫是我离不开的“小朋友”。我成了“大院”的主人，什么地方可以逮到蝈蝈，什么地方可以逮到蟋蟀，我都一清二楚。蝈蝈、蟋蟀的声音很好听，我把它们放在小缸子里，叫声更好听。可是我从来不去斗蟋蟀。

从此再也不感到冷清寂寞了，但是有一天在“大院”里遇到了突然事件。

那天我发现了一只黑色淡黄花斑的蝴蝶，它很好看，我蹑手蹑脚去逮它。这时有几



只蜜蜂在我身边嗡嗡地叫，我去赶它们，不料蜜蜂越聚越多。蝴蝶没捉到，我的脸上、脖子上都被蜜蜂蜇得很厉害，针刺一般的奇痛，很是难受，我抱头飞跑，它们却穷追不舍。我跑回家钻进被窝，蜜蜂也被盖在里面。这时母亲还未上班，看我狼狈的样子，又可怜又生气，赶紧把被子掀开，用扇子驱赶蜜蜂，又抓了一把白糖撒在小院地上。蜜蜂终于飞跑了，可是我的头脸、脖子肿得像个面包。母亲匆忙给我涂消炎药，她是医生，家里常备着一些消炎、消肿的药，我记得这药叫莱基却尔，很有效，但是黑色的，我的脸又肿又黑，只得躲在家里蒙着被子假装睡觉。难怪我母亲说我是“蔫儿淘”，平时并不吵闹，可是不声不响地尽惹出麻烦的事。经过这一次教训，我再不恋着我的“小朋友”了，从此再也没有去“大院”。

寄宿笃志女校

还不到七周岁，妈妈把我和九岁的姐姐送到一所天主教创办的笃志女校寄宿了一段时间。爸爸妈妈为了党的地下工作不得已只能借钱送我们上这所收费相当高的教会学校。学校在西城承恩寺街，校舍和教室现在都还在，只是很凋零，很破落，看来不久即将拆去。当时我们这些小女孩住在这木结构建筑的二层楼上，校长和老师住在楼下。他们多数是外国修女，只有少数中国人，都穿着黑色长袍。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个总管事徐老师和很胖的miss卡特。每天早晨一打铃，我们便急忙起床、洗脸，从木楼梯往下跑到食堂吃早饭。接着我们几个小一点的到miss卡特屋里围着小圆桌做祷告，她念一句，我们跟一句。每逢星期天，跑到大约二百米外的小教堂做礼拜，我跪在那里，很不耐烦，睁开眼偷看别人，有的女孩也在偷着瞧呢！

Miss卡特教我们认英语字母，我在这时学会了ABCD……但主要是做手工——穿珠子项链。桌上放着一大盘红红绿绿的大小珠子，谁要是穿得好，可以带在脖子上一天，得到这奖励好高兴。项链穿了拆，拆了又穿，当时不理解，后来才悟到是磨炼耐性，收孩子的心。祷告、唱诗、穿珠子，还有一大早把被子晒在二楼栏杆上，这便是我们一天的生活。念书倒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记得有一个礼拜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被起床铃惊醒，匆忙中我穿错了姐姐的衣服，把她的衣服套在了我衣服外面。她没有找到她的衣服，很慌张，就没有上教堂。当然受到了处分，罚站好长时间，直到我们做了礼拜回来。

学校的伙食还好，早晨油条、豆浆，天天这样。不知什么原因，几天后我感到油条有煤油味，以后吃什么都有煤油味，就这样病倒了，还进医院住了几天。妈妈得讯来看

我们，因为交不出医药费，我和姐姐便从后院土石堆上出了垣墙，连藤编箱子也顾不上拿了，妈妈在墙外接应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笃志学校。

在孤儿工读园

和我们同住西总布胡同51号中央美术学院宿舍的油画家李骏，画了一幅一平方米大的人物肖像，这方脸白髯的长者看上去是一名学者。我问画家画的是谁，他说是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要举办陈垣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李骏同志曾在北师大美术系任教，他承担了画肖像的任务。

我想起在孩提时代住过的北京孤儿工读园就是陈垣先生创办的，在《童年》独白中我提到了工读园的一些情况。那时年幼，对陈老先生一无所知，经李骏介绍，认识了陈垣先生的学生刘乃和女士，她曾是辅仁大学的教师，早年担任陈垣的秘书，后来一直负责陈垣身后的许多工作——整理遗作、遗物，组织研究陈垣生平，安排即将召开的百年诞辰纪念会等等。乃和女士执笔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北京孤儿工读园时写道：“一九二零年，华北大旱，遍地灾黎。他（陈垣）和朋友筹办‘北京工读园’，次年二月开学，收容河北孤儿二百余人，半工半读，使无家可归的孤儿得到安置。这年九月又创办平民中学，除招收一部分小学毕业生外，并大量招收河北灾区青年就学。他在校任校长，兼教文史课程。”

现在推算起来，创办平民中学的时候，我已离开了孤儿园。该园地址是在西城翊教寺街，后来改为四十二中。刘乃和女士还送了我两张有孤儿园校徽的照片。我特地去了孤儿园的旧址，还依稀撩起了那幼时的情感。幼时实在很蒙昧，怎能懂得创办孤儿园在我国教育事业上的重大意义，更不知陈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立下的功勋，包括首创北京孤儿工读园对灾区儿童的恩德和造福。

我在孤儿工读园的时间不长，因为年小，现在记不起别的事情来。从工读园出来，我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被送给张姓人家。

过寄张家

张寓峰的第二个妻子是我母亲在北京医科专科学校的同学。张寓峰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在北洋政府做个小官，前妻去世后留有一子，又续娶一妻，愿收我作为过房女儿。她给我改名张文湘，后来又改为张文秀。这张家住在西城闹市口附近的城隍庙街，男主人



• 孤儿工读园工字形徽记
(铜质镇纸)

在北洋政府当文职，就在马路对面一个大院中办公。他老婆和岳母很迷信，算我的“八字”命不好，先是给我改名、照像去晦气，后又试探我是否能真心背叛自己的亲人，办法是要我用小孩玩的弓箭朝窗外射，表示决心射到我母亲身上，从此和母亲一刀两段。我不肯这样做，他们就认为养不住，对我很冷淡，把我看作使女还不如。这母女俩又嗜毒，背着主人抽大烟，教我给她们熬烟胶，烧鸦片泡，侍候她们腾云驾雾。我有时不适，伤风感冒，她们用鸦片烟朝我脸上喷，倒也见效，但弄得我头晕脑胀。

这时期，我也上过私塾，念过“千字文”、“百家姓”。上私塾只是认识了几个字，老师逼着一遍一遍念，我只好摇晃着身子像钟摆似的死记硬背，谈不上什么知识。“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无所收获。可是有一件事，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便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中央公园举行公众吊唁，老太太带了我到灵堂行礼致敬。灵堂设在中央公园中山堂，很长的队伍从大门一直排到“五色土”后面的大厅，好不容易鱼贯走入大厅正中，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躺在玻璃棺中。人们走近去向总理（那时称孙中山为孙总理）遗体鞠躬，老太太没有文化却鞠躬很深，动作很慢，而且鞠躬后不挪动，只凝神站着，以致后面的人挤上来踩了我的脚。我催她快走，她还不高兴，看来她倒是很敬仰孙中山先生的。

过不多久，张寓峰发妻所生儿子从乡下来到北京，这是一个蛮横的小子。他见我我是外来人，竟把我绑在天棚柱子上用鞭子抽我，像抽打牲口一样叫喊：“快走！”我不是好惹的，在自家孩子中也不饶人，连母亲打我也从不求饶。我被绑着手不能动，只能用脚踢，于是和这小子打闹起来。老母女俩自然护着那小子，明明是蛮横小子欺侮我，倒说我的不是。还因我把邮局寄来的一方砚台从邮差手里接过来时落地砸碎了，说我不顺从，不听使唤，就要把这个已经改了姓名的过房女撵出门去。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时候，母亲来张家看我，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老同学和家里的人竟如此凶狠，他的儿子又那么可恶，心里凉了半截。本来妈妈以为我在张家可以安顿下来，所以把照顾弟弟钱江的老张妈也介绍到了张家。老张妈又很惦念钱江，又把钱江接到张家。谁知一到这里就遇上了煤气中毒，差点把两人熏死。我母亲看到这些情况，才觉得这个老同学太不像话，就把我们一起带回家了。

拜琴雪芳学艺

有人说我长得像毕云霞（当时北京很有名的花旦），母亲想起宁协万（大姐夫）以前教过琴雪芳文化课，于是请他想法把我送到琴家班子学京剧。琴雪芳此时在上海正叫红，

能拜她为师算是交好运。

宁协万趁他一次公差，把我带到了上海，拜琴雪芳为师。琴雪芳住在一户三层楼的石库门里，她住在二楼，楼上住着马连良，楼下住着俞正廷，都是红得发紫的名角儿。我对学京剧却不热情，特别使我不自在的是，我从小不吃牛羊肉，这是受母亲的影响，非但一口不吃，连闻也不能闻。可是琴雪芳和马连良都是回族，两家一到做饭时就散发出浓烈的膻味，把我熏得想吐，连饭都吃不下，只好在晚上拿琴家库房里的皮蛋吃。她家是北方人，不吃皮蛋，对此他们根本不理睬。天长日久，我每天都饿得够呛。

教青衣的师傅叫刘寒香，已是一个老头儿。有一次教《彩楼配》，老师教唱：“梳妆打扮出绣房，在二堂，辞别了二老爹娘……”我不知怎的唱成了：“梳妆打扮出绣楼，在二堂，辞别了二老爹牛……。”没想到，这看上去很威严的老头其实不是好东西，利用我唱错，打我，又用手浑身乱摸我，我于是和他大打出手。

当时宁协万在上海有公务，他把姐姐也接到了上海。我一再要求回家，宁协万只好给我买了一张到天津的船票，给了我五块钱，把我托给他的一个学生带回北京。这个带我的人买的是吊铺，我的票是统舱，这人上船后根本不管我，我只好在杂乱的人群中瞎混，连个安身的角落也没找到，我就坐在舱门口。不料，查票的来了，说我已超过半票的年龄，还要补八元钱。我说没有，他就凶狠地满船追我，还要搜我的身。我急了，因为衣衫里有五元钱，抄走了怎么办？从天津到北京还需要花钱呀！我实在着慌了，忽然想起一句江湖话，很胆怯地说：“要钱没钱，要命有命。”船上的乘客见我实在可怜，在盘问清楚我的情况之后，给我说情，查票的也就算了。

可是，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平时倔强的性格一时颓丧起来，船过“黑水洋”，人们说这里最险恶，突然想到死了也罢。我走在甲板上，扒着铁栏杆想爬，有个小女孩却走过来想和我一起玩。她给我一只苹果，又问我怎样玩法。这孩子穿着很整齐、讲究，后来听船客说是张宗昌小老婆所生的。那时有个阿姨带着她在甲板上，我见她同情我，便接了那只很大的苹果，一边吃，大家一起玩。胡乱过了两夜，船到天津，上岸后一人摸索着走到火车站，见有卖梨的，用一块钱买了一小篓。母亲曾说过，这种莱阳梨很好吃，我想应该带点回家去。

身上还有两元钱，不知道去北京的火车票多少钱一张。那时的天津车站很乱，进出也不严，我走进月台，看到有装猪的车皮，便爬上去蹲在一个角落里。等了好久好久，车慢慢开动了，没有人发觉我，他们当然不会想到有人会 and 猪蹲在一起。这火车走得真慢，可终于到北京了。我很快跑出车站，急着回家去，满心高兴，一口气从前门快步走到了锣鼓胡同。我敲门，母亲开门见是我一个人回来，很惊奇，却问：“大姐他们呢？”我告

诉了姐姐要等宁协万公事办完才回来，随后母亲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回来。我把在琴雪芳那里学艺受屈的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表示坚决不再去这种地方。母亲热泪盈眶，我也跟着哭了。

住在兴盛胡同的日子

从琴雪芳家跑回来时，姐姐已与宁协万结婚。宁家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是前妻所生。此时我家租住宁家的房子，我和那四个孩子常常一起玩耍。我感到自由自在，和这些调皮的孩子们想出各种玩法。有一天大清早，父母亲还未起床，我们把窗板、门板、藤椅搬出来作“工事”，玩打仗。可一不当心，“工事”倒塌，把爸妈吵醒了。那些孩子知道闯祸了，赶快溜跑，只剩我一个人在收拾残局。爸爸从房里出来，二话没说，弯曲食指在我头上敲了几下栗凿（俗话“吃栗子”）。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这次受罚更是使我委屈，因为我没有溜跑还收拾东西，觉得老实反而吃亏了。但是也自责，爸爸劳累一天，大清早被吵醒，确实是我们这些孩子太不懂事。

兴盛胡同宁家房子，至今还在，宁家的后辈还住在那里。我去看望姐姐时，走进胡同见到那盏路灯总要回忆起小时候在路灯下跳舞的情景。我爱跳舞大概是有点天赋，后来参加了黎锦晖的歌舞团也证明了我的能力。兴盛胡同的路灯很暗淡，我总是一个人在灯光下唱歌跳舞，至今还记得经常自发地演习歌舞，“渔翁乐陶然，驾小船。身穿蓑衣裳，手持钓鱼杆。船头站，捉鱼进竹篮……”邻居们吃过晚饭，到胡同来乘凉时，喜欢看我的表演，常常围着很多人，我也觉得越跳越起劲。我小名叫小旺，人们夸我说：别看小旺“蔫儿淘”，常惹她妈生气，可会跳舞，还能唱歌，说不定长大会有出息呢。

在这一段时期，我也上过学——梁家园和二十二小学，但没有多久，我们离开了兴盛胡同。

远送张家口

由于父母亲工作的关系，不久我们搬出宁家，住到平安里一座三层楼中。这座房子一直保留到去年开通平安大街时才拆去。父母亲一边行医一边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在此时已稍有感触，有时发生好奇心。我虽然淘气，但是只要母亲叮嘱我的事，我是认真做的。譬如有时她带我坐人力车到一个地方，她去办事，嘱我坐在车上等她回来，我是决





不会乱跑的。有时听到父母说什么，虽然好奇，我也决不问，决不说的。关于这些情况，我在后文也有提及。

但有一次，我这个“蔫儿淘”几乎惹了大祸。有天晚上，爸妈在床上说，明天早上要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去开会。我心想中央公园一定很好玩，便想法偷着去看看。此时我有任务照看小弟钱江，第二天吃过中饭，我装着和母亲通电话（实际上是我按住电话自己和自己对话），我大声说我们马上来。随即对老张妈说，母亲叫我和弟弟去公园，她在那里等着我们。我向老张妈要了二十个铜板，拉了钱江坐了一段黄包车。还买了一些糖球给弟弟吃。可是到了公园怎么也找不到“来今雨轩”，背着弟弟把整个公园前后走遍了，没有认清哪儿是“来今雨轩”。眼看天色晚了，只得往回家走，弟弟哭了，我塞一个糖球到他嘴里。也亏我背着弟弟走回家，已经快十点钟了。

父母回家没有看到我们，老张妈说是你们打电话让他们去公园的。这下全家慌乱起来，父母赶紧跳上环城有轨电车去中央公园找，有个管事的说看到两个小孩在筒子河（沿紫禁城）边玩，后来不知哪里去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踪影，只能空着急，打电话回家，说是回家了。这件事激怒了娘妈（祖母），一定要惩罚我。妈妈虽然生气，还是可怜我，只用鸡毛掸子往板凳上打，我假装哇哇哭，就这样哄过了娘妈。

就因为我太调皮，于是又想法送到别人家去寄养。不久父母又要外出，决定把我送到张家口方家。主人方维之，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我母亲的远房姊妹。母亲曾过房给姓左的家里，这姊妹是左家的人。我到方家说是当养女，但仍用原名钱蓁蓁。

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坐火车到了张家口。我到方家不到三天，新棉袄便成了他家小孩的尿垫，给我穿的是一件旧夹衣，把我冻得够呛。我在方家要做许多事，早晨填鸭，晚上纳鞋底。打扫、洗衣、买菜不算，还要帮大姑妈（女主人）做饭。方维之后来又娶二姑妈做二房，从此烧饭的工作完全落到我的身上。这三个都是大烟鬼，到半夜还要我做宵夜吃，弄得我不能好好睡觉。白天既忙个不停，吃的又是残羹剩饭，我的身体日渐衰弱，几乎不能支持。

方家的南房住过一户新婚的房客，因为这婚姻是强迫的，新娘在过门不久便上吊自尽了，从此屋子紧闭着，老是阴森森的。方家住在西屋，我住在东屋下房。有一天半夜，做完宵夜，拿着朝西房走，走过南屋时心里有点害怕，越是害怕越瞟着空屋看，为了壮胆，嘴里念叨着在笃志女校学来的“耶稣爱我，我真知……”忽然看到月下走出白色的人影，把我吓得把一笼刚蒸熟的包子全打翻在院子里。我当时才十二岁，产生见鬼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失手打翻包子可惹怒了主人，他们把我臭骂了一顿，从此更加重了我的劳务，而且说话伤人，到了欺凌侮辱的程度。

一天，我背着方家小孩买菜回来，正在爬山坡歇脚时，我母亲的一个同学发现了我，她叫道：“这不是小旺么，你怎么在这儿！”她见我穿得破破烂烂，瘦了好多，已经面呈病容，十分可怜，就立即写信给我母亲说，你再不去把小旺弄回来，恐怕就见不到她了！母亲得信赶到张家口，把我救出这火坑。

我的第四个落脚点就此结束，当时直奉战争爆发，我们离开张家口后，京奉火车就不通了。如果母亲晚来一步，我不知还将落到什么地步！

一家子演电影

我又回到平安里那座灰色瓦的旧洋房，但见来往的人很多，男女都有。“五四”运动后男女社交很活跃、很公开，有时很浪漫。父母亲和朋友们时常打牌，但又叫我在大门口守着，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很紧张，好像是开什么会。

就在平安里我家附近，有一个红色大门的露天电影摄影棚，里面是一家电影公司。主人是徐光华。爸爸和徐光华正在筹备拍摄一部电影，名叫《燕山侠隐》。在中国电影史上有记载，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我们一家人都参加表演，女演员中还有雍竹君(外国人)、伍丽琳。胡北风(胡底)也参加了，他曾在上海但杜宇的电影公司工作过，有些电影工作经验。他和我父亲及李克农都是地下工作者，周总理称他们为白区三杰。顾顺章叛变后都转移到江西苏区，活跃在红军的戏剧运动中。胡底在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

在影片中，我妈妈扮演我爸爸的母亲，我扮演爸爸的妹妹。有一场戏，爸爸的父亲要赶他出家门，爸爸的母亲舍不得儿子，只是哭，我拖住哥哥(我爸爸)不放，不让他走，也要哭，但是我哭不出，反而笑。因为我觉得我拖的是我爸爸，嘴里却叫哥哥，很可笑。这场戏拍了多次不行，我妈妈生气打了我，我真的哭了，最后拍成了。大家就夸我，没想到以后真的和电影结了缘。

这部电影拍成后，经营人送到日本去放映，赚的钱被办事的人吃喝玩乐用完了。现在国内没有拷贝，可能在日本也找不到了。爸爸为什么要参加拍电影，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当然有他个人的爱好，也还有其他工作上的需要，曾听说还准备拍西太后，因“四一二”事件后时局大变而作罢。

随着政局的变幻，父母亲处境愈加困难，决定转移到上海，我也随同。这次是我父亲亲自顾问我的去路，他看到我在兴盛胡同路灯下的舞蹈、歌唱以及拍摄电影时的表演，认为我在这方面有一定专长，当他在上海报纸上看到黎锦晖创办中华歌舞团的招生广告时，决定让我去报考，并亲自送我去见黎先生。如果说我一生还没有虚度年华，总算还





• 我的父亲和母亲



• 设计为毛笔题字 一九四六年
陆军中央训练所中央训练所